

文章编号:2095-0365(2018)01-0024-06

贫困户收入结构、增收陷阱与优化研究

——基于宁德市129户贫困户抽样调查

吴奶金, 谢晓维, 杨雅莉, 刘飞翔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持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基于宁德市27个村庄129户贫困户的调研,发现贫困户经营性收入严重不足,工资性、财产性收入增长空间大,转移性收入是当前贫困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受农业本身的弱质性、贫困户劳动力迁徙意愿低、医疗支出大、转移性收入高等因素影响。最后提出建立贫困户资产性收益机制、发展在地化特色产业、实施健康医疗政策、构建农村金融扶贫体系等措施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增加贫困户收入。

关键词:贫困户;收入结构;资产性收益;扶贫开发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bskb.2018.01.04

2016年国家《“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指出: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确保贫困户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稳定增长,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地方配套实行,使财政压力逐年加大。福建省委、省政府要求到2018年福建省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承诺期临近,扶贫任务艰巨。宁德市国定贫困人口39 651人,已脱贫23 410人,仍有16 241人未脱贫,各县市顺利完成脱贫任务难度大。

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扶贫进入攻坚期,因缺技术、资金等造成的贫困多已实现脱贫,因老、病、残等原因致贫的脱贫难度大;另一方面,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数字脱贫”、被动脱贫现象时有发生,影响整体扶贫效果。如何把“一次性”财政扶贫方式变成“细水长流”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政府扶贫转移支出合理、贫困户收

入可持续增长的扶贫道路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基于贫困户收入结构分析,总结贫困户增收困境,提出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的对策建议,致力于提高扶贫开发效率,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福建省共有2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其中宁德市6个为全省最多^[1],占福建省贫困县的26.09%。同时,宁德市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核心思想精准扶贫的发源地,探索具有宁德特色的扶贫开发新路子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此,选取宁德市为样本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与贫困户总户数等指标,抽取宁德市3个县(市),以同样原则随机抽取9个乡镇,27个村共129户贫困户。同时引用2016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宁德市统计年鉴,201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等

收稿日期:2017-10-11

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8R0101);福建农林大学农村区域发展本科科研训练基地项目(2015B001);福建农林大学探索建立贫困户资产性收益的机制研究项目(2016X001)

作者简介:吴奶金(199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与区域发展。

本文信息:吴奶金,谢晓维,杨雅莉,等.贫困户收入结构、增收陷阱与优化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1):24-29.

相关数据,从贫困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方面进行研究。

二、样本特征的一般性分析

(一)劳动力不足,病、残、学人员比重大

从调研的129户贫困户情况看,户籍人口为521人,常住人口为343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133人,占户籍人口的25.52%;16岁以下未成年人79人,占户籍人口的15.16%;具有劳动能力243人,占户籍人口的46.64%;家中有残疾人和重病病人的占户籍人口的14.59%。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重病病人比重高;在外务工人员为79人,户均0.61个;在外求学60人,户均0.47个。家庭劳动力不足,因病、因残、因学支出负担重,成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

(二)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知识性贫困是引起家庭贫困的主因,而教育又是衡量知识水平的重要指标^[2];家庭经济发展与受教育程度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受教育程度低,致使贫困户发展遭遇瓶颈^[3],全国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为中小学以下的占38.20%,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以上占12.50%^[4]。从调研的129户贫困户户主受教育情况看,全部为中小学以下学历,其中小学及以下学历116户,占总户数的89.92%。当前,贫困户总体受教育水平低,且贫困户家庭主要成员年龄偏大,致使教育扶贫难度加大。

(三)过度就业与多工作状态并存

在相同的工作或其他工作中,人们愿意用过多的小时数从事不相关行业,也接受相应的收入减少^[5]被称为过度就业。调查中发现,贫困户从事多种农业生产活动,同时参与一定的务工劳动,兼业率为16.45%。从工作时长上看,每天劳动时间在8~10小时的贫困户占样本总量的60.87%,多数属于非正式工作。收入无法获得相应保障,也缺少必要的人文关怀,仅从“两不愁、三保障”很难全面了解贫困户的真实需求。

(四)“两不愁、三保障”初步实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

出,到2020年扶贫开发对象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贫困户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加强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工作力度,贫困户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抽样的各县市根据贫困户家属不同受教育阶段实施不同补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贫困户教育成本负担;新农保、新农合参保率达73.91%和94.21%,75%贫困户实现两保障,其余25%贫困户保障性住房正在建设中。但总体看,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三、贫困户收入结构实证研究

家庭收入结构是反映收入稳定性、持续性的重要因子,贫困户收入结构与普通农民收入结构存在反差,收入结构不合理成为贫困户收入难以持续增长的主因。以转移性收入为主导的贫困户收入结构缺乏内生性,脱贫后未能及时稳定就业,又缺乏产业支撑,返贫风险较高,也不利于扶贫开发的可持续。

(一)家庭经营性收入分析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贫困人口重要的自我发展收入来源,宁德样本贫困户家庭经营净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26%。研究表明,农村机械总动力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6],但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农业生产机械和农业投入,使家庭经营性收入难有提升。贫困户样本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为611.90元,不足宁德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净收入的8.30%。其中农业收入占家庭经营净收入的67.83%,养殖业占19.53%。缺少必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导致贫困户无法有效提升家庭经营性收入^[7]。

(二)工资性收入分析

增加工资性收入是破解贫困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近年来,农村居民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务工性收入的增加,已使一部分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转而寻求二、三产业的全职工作,宁德市贫困户工资性收入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81%。但对于多数外出务工者来说,外出务工成本高、不确定因素多。一方面,贫困户家庭成员受教育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多分布于服装制造业、餐饮服务业以及建筑行业等;另一方面,贫困户家庭有效劳动力

不足,同时,家中的病人、残疾人制约其外出,使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面临挑战。基于此,尝试发展中小型乡村特色工厂、草根工厂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贫困户在地工作,提高贫困户工资性收入。

(三)财产性收入分析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益,从林权改革到土地确权都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益做前期准备。要完善收入结构和分配制度必须要使财产性收入得到有效提升^[8]。福建省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1.69%,宁德市贫困户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2.27%,略高于全省水平。在财产性收入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实施优惠政策,着力提高贫困户财产性收入是可行的。从结构上看,贫困户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于土地流转和入股分红,两者占贫困户财产性收入的92.85%,人均均为85.40元。总体看,资产性要素不足,获取途径单一成为制约贫困户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主因。

(四)转移性收入分析

转移净收入是人均收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农村居民而言,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相对较小^[9],这是在现行分配制度下产生的收入格局。随着扶贫总目标的确定,贫困户的转移性收入不断上涨,2015年贫困户人均转移净收入1831.22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48.66%。根据调研情况,贫困户户均4人计算,每年可获得转移净收入7324.88元。其中贫困补助金约1243.86元,占人均转移净收入的67.92%。提高转移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有利于农村居民形成对未来的积极预期^[10]。基于贫困户角度,转移性收入是维持基本生活的重要保障,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养老和医疗负担。

四、收入结构视角下的贫困户增收陷阱

(一)农业弱质性制约收入增长

农业弱质性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已得到很大改变。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环境未有较大改变,尤其是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相对落后。同时环境型贫困也是当前扶贫开发的难

点。在宁德市前三轮的扶贫工作中,一般性贫困多已解决,落后、偏远村落的农业生产在自然环境中很难有效改善,也缺乏大型农业设施入驻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多数贫困户仍然以传统种植业为主,依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增加收入的可能性极低。部分贫困户在帮扶下引进新品种,由于管理不善存在入不敷出现象;也存在部分农产品因收益高,村民一拥而上导致产品供过于求,压低市场价格。农业弱质性成为影响贫困户家庭经营性增加的主要原因,如何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是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关键。

(二)劳动力不足,且迁徙意愿低

通过调研发现,宁德市贫困户户均劳动力1.88个,年龄结构偏大,文化层次低,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劳动力素质决定了劳动者所服务的行业 and 创造的价值。农村总体劳动力过剩的大环境下,贫困户总体劳动力略显不足,缺乏竞争优势。同时,由于劳动技能缺乏,传统观念束缚及文化层次低等因素,造成贫困户劳动力迁徙意愿低。残疾人和重病病人家属户均0.9个,导致劳动力转移受限,影响贫困户收入增加。家庭子女数目与老人数目对贫困户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影响迁徙意愿^[11]。另一方面,早期缺乏组织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现状并未有所改善,一定程度上影响迁徙意愿。自发性形成的迁徙行为是政府组织外出务工的前提,以往政府主导的技能培训,参与度低且效果不佳。

(三)医疗支出大,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

农村有一部分慢性病是由于缺乏医疗知识造成的,出现“小病不看,大病难办”的现象,成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医疗支出占贫困户家庭总支出的51.53%(见图1)。慢性病和重病家属需要药物长期维持,总量上看,药物支出已经超过贫困户日常生活支出,79.69%的贫困户无法承担医疗费用,医疗支出成为当前贫困户的主要负担。25%的贫困户未参加新农保,从长远看将影响自身养老质量,也影响整体扶贫效果。在94.21%的贫困户参与新农合的情况下,接近八成无法承担医疗费用,说明大病保障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多数药物没有列入药物报销清单,导致有需求的村民无法享受国家医疗保障。完善医疗

保障制度,是改善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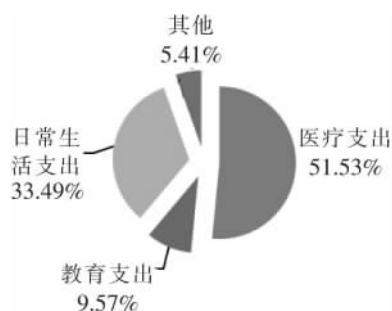


图1 样本贫困户家庭支出比重图

(四) 转移性收入高,陷入收入“合理化”陷阱

十八大以来政府加大扶贫力度,在财政专项资金上呈现增长态势,使更多贫困户得到实惠。贫困户接近一半的收入来自于政府转移性支出,大幅度拉高贫困户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也出现部分贫困户依赖政府转移性支出现象,在贫困户建档立卡及退出机制上引发诸多矛盾。贫困户中一部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在获取转移性收入时,容易陷入收入“合理化”陷阱,助长“等、靠、要”思想。脱贫主要依赖政府大幅度提高的转移性收入缺乏长效性,不利于脱贫户的可持续发展。转移性收入在农户之间的不平衡,也使得政策不具有持续性和长远性。此外,转移性收入应避免采取现金直补形式,转为发展基金,并积极引导将有助于增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五、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实现可持续增收的路径探析

(一) 建立贫困户资产性收益机制,导入收益持续性

理清集体资产、量化股权、赋予贫困户股权等,将农村集体土地、森林、水面等集体资产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划出适当比例定为贫困户优先股,建立贫困户进退机制。把以上资产流转出租,或量化折股设立股份合作社,引进资产收益良好的企业、合作社取得资产收益后按照股份分红。

合理投资扶贫资金,设立村级贫困基金会。允许各项扶贫资金的整合与投资,经上级政府和贫困户同意后,运用各类扶贫资金设立扶贫基金会,投入养殖、水电、乡村旅游、保险理财产品等项

目形成新的资产,从而取得资产性收益。将扶贫资金股份量化后,合理划分比例给贫困户和村集体,一般贫困户的比例不低于50%。资产可由村集体或聘用经理经营。这种模式不仅能解决扶贫资金分散、扶贫效率低等不足,而且能提高贫困户和村集体的资产性收益。同时,鼓励村组织、农村能人利用扶贫资产成立经济体,发挥农村组织、农村能人的优势,明确经济体的扶贫性质,收益优先分配给贫困户,增加贫困户收益。

(二) 挖掘在地化特色产业,保障发展可行性

如何挖掘在地化特色产业,避免大批贫困劳动力向外转移,实现在地化就业是提高贫困户务工性收入的重要途径。福鼎市深入挖掘区位优势,科学探索中药材种植的可行性,组织贫困户种植黄栀子。一方面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发展特色中药材产业,调动贫困户参与生产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对于地多、人少的贫困户,盘活其耕地、山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增加资产性收益。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是帮助残疾人获得职业技能实现就业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方式^[12]。在贫困户相对聚集区,挖掘特色产业,同时进行特殊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参与到特色产业的生产加工中,即发展特色产业,又带动就业。对特殊劳动力进行特殊培训,进行轻体力劳动的工作,积极培育剪纸、书法、编织等当地文化。构建双向需求平台,一方面满足合适企业的招聘需求,另一方面,解决贫困户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也有利于其创造自身社会价值。

(三) 实施健康扶贫政策,盯住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

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53.93%,致使家庭负担加重,要改变贫困户的收入结构,其中重要的环节是如何改变支出结构,降低医疗支付比例。因此要实施健康扶贫政策,包括扶贫产业的健康性、健康知识的传播、健康问题的监测与分析以及农村医疗体系的完善。

首先是扶贫产业的健康性。贫困集中区往往是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地方,在引进企业参与扶

贫时,要充分论证企业的环保和可持续问题,发挥贫困区的生态优势,打造健康产业。其次是健康知识的宣传。积极引导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和志愿者深入村庄、贫困户,开展健康知识的讲解与指导,改变影响健康的不良习惯。再次是健康问题的监测与分析。在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时,携带必要的监测设备,为贫困户做初步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最后是完善农村医疗体系。在有条件的村庄地方修建卫生所,缩短救治时间与距离,在个别偏远村庄设立固定观察点,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体检、赠药等活动。

(四)构建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增强内生发展牵引力

让贫困户享有更多金融服务,增强金融扶贫效力,增加贫困户收入。贫困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金融服务,当金融服务进入贫困群体时,对贫困户收入水平提高有显著效应,贫困发生率也将进一步降低^[13]。在此背景下,引导经营较好的金融部门下乡,在政府信誉担保下,降低贫困户借贷成本,简化借贷程序。

完善农村金融扶贫体系,优化农村信用环境。建立“普惠式”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创新农村金融扶贫政策,给予市场和地方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贫困户可适当放宽条件。另一方面,加强宣传和引导,转变贫困户发展观念,提高金融产品的使用率,并在农村中评选示范户、担保人等,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

建立科学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农村金融市场潜力巨大,当前贫困户的发展依赖多方扶持,消除贫困户对金融产品的传统观念,鼓励其参与到金

融市场。但也应意识到当前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不成熟、农户抵押品不足、还贷能力低导致金融部门不愿扩展农村业务。因此要加大技术投入,多维度进行创新,严格控制农村金融信贷过程中的风险^[14],建立有效制约和保障机制。

六、结论

要完成脱贫任务,必须大幅度提高贫困户收入,同时优化贫困户收入结构,使收入增长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通过调研数据分析,贫困户收入结构正发生变化,但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高,难掩贫困户自身经营性收入低的现实。当前扶贫的主要方式在于提高转移性收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发生本质,只能缓和贫困程度,这种帮扶方式并不能确保脱贫后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收入增长不具可持续性成为扶贫工作的难点。现阶段扶贫开发在某些地区仍以收入作为衡量贫困的唯一标准,忽视收入结构不合理性,从长远看并不能保障贫困人口彻底脱贫。政府逐年提升扶贫专项资金,随着贫困户转移性收入不断提高,从表面上看,极大改善了贫困户的生活现状,但缺乏可持续性。

习总书记指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长困难的核心在于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不全力扶志、扶智,即使一度脱贫,也可能会再度返贫,因此要着力提升贫困户的自我发展意愿,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从贫困户的收入结构入手,合理的收入增长结构是保证收入增长持续性的重要因素,也是扶贫需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贺东航,牛宗岭.精准扶贫成效的区域比较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11):58-65.
- [2]向运华,刘欢.保障性扶贫模式下社会救助助推精准扶贫的实证分析——基于1989—2011年CHNS数据库9次调查数据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5):63-73.
- [3]肖云,赵品强.农村低保家庭子女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救助研究——基于农村反贫困视角[J].农村经济,2010(5):126-129.
- [4]丘秀珍,吴奶金,刘飞翔.福建省农科院校服务农业推广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J].台湾农业探索,2016(6):66-70.
- [5]萨比娜·阿尔基尔.贫困的缺失维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5-30.
- [6]陈娟,杜兴端.我国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实证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4(6):49-54.
- [7]张志军,鲁黛迪.农业科技进步水平与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关系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3(8):103-105.
- [8]金丽馥,冉双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究[J].经济纵横,2010(11):53-56.

- [9] 陈享光,孙科. 转移性收入的城乡不平衡问题研究[J]. 学习与探索,2013(6):100-105.
- [10] 胡兵,涂先进,胡宝娣. 转移性收入对农村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J]. 财贸研究,2014(1):55-60.
- [11] 李翠锦.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西北人口,2014(1):34-38,44.
- [12] 杨柳,崔铭香. 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问题与策略[J]. 中国成人教育,2016(1):127-131.
- [13] 王鸾凤,朱小梅,吴秋实. 农村金融扶贫的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为例[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6):99-103.
- [14] 郭威. 农村金融扶贫的经验、困境与对策——以广西富川县为例[J]. 理论探索,2013(5):98-102.

Research on the Income Structure, Income Trap and Optimization of Poor Households: Based on Sampling Survey of 129 Poor Households in Ningde City

Wu Naijin, Xie Xiaowei, Yang Yali, Liu Fei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Optimizing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poor household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also the key to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revenue growth.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29 poor households in 27 villages, operational income is seriously insufficient, and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to increase the wage and property income, and the transfer income has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Agriculture constitute, the low willingness of the poor labor force to migrate, high medical expenses and high metastatic income impact poor incom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some aspects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asset revenue mechanism about the poor households,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carrying out the health care policy, and construc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system of rural financial to increase income of poor households, and then optimizes the income structure of poor households.

Key words: poor households; income structure; asset incom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